



中国近代史上的 激进与保守

**Radical Ideas and Conservative
ideas in Modern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 主办
郑大华 邹小站 ●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第八辑)

中国近代史上的 激进与保守

Radical Ideas and Conservative
ideas in Modern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 主办
郑大华 邹小站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郑大华, 邹小站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8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

ISBN 978-7-5097-2588-7

I. ①中… II. ①郑… ②邹…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B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50843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 (第八辑)

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

主 办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

主 编 / 郑大华 邹小站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责任编辑 / 刘 丹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责任校对 / 王福仓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张晓莉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8.75

版 次 /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字 数 / 511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2588-7

定 价 / 8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对话

主持人：危兆盖

特邀嘉宾：郑大华（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何晓明（湖北大学教授）

俞祖华（鲁东大学教授）

“激进与保守”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引起过几次大的争论。这一牵涉中国近代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极其复杂的课题并非是几次大的争论就能解决的，需要继续加以讨论和深化。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心联合洛阳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于 2010 年 8 月 16~17 日在故都洛阳召开了“第三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主题便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来自国内外近 80 名专家学者就会议主题展开了充分讨论。会议期间，《光明日报》记者危兆盖专门采访了湖南师范大学“芙蓉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郑大华教授，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的何晓明教授和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的俞祖华教授，请他们就“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有关问题各抒己见。现将整理后的采访稿予以刊发，希望借此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更深入探讨。

主持人：如何定义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

郑大华：在讨论“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之前，我们先看看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的来历与含义。激进主义是指要求从根本上改变某种社会政治制度或者这种制度的某个或某些部分的理论观点与行动。一般认为，

“激进”一词源于英国，后来又首先为法国所采用。在 19 世纪上半叶，激进主义多用于说明当时在英、法两国主张实行男子普选权或要求实行共和制的观点。自从马克思主义问世以后，西方所说的激进主义又多指马克思主义以及声明拥护或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左翼”党派或组织的理论见解与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激进主义的含义又有所扩大，不仅一切与现行政治秩序相敌对的个人和集团的言论和行动，就是一党一派或某组织中违背多数人普遍意见的相对“左”的观点，也往往被戴上激进主义的帽子。保守主义是指主张维持现状，反对激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势力和思想流派。一般认为保守主义思潮的鼻祖是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他在法国大革命后写了《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一书，该书批评大革命是企图切断复杂的人类社会关系的实验，认为它已经演变为一场颠覆传统和正当权威的暴力叛乱，沦为了一场大灾难，而非追求代议制、宪法民主的改革运动。因此在西方话语中，所谓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大多指的是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但在近代中国，除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外，还存在着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歧在社会制度方面，前者主张全面改革甚至革命，后者主张维持现状或少许改良。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歧在思想文化方面，前者主张西化或全盘西化，后者主张认同、维护传统。我们在谈论或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时，就必须对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进行区分，不要将它们混为一谈。否则，许多问题无法谈清楚。这也是这些年来关于“激进与保守”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而就中国学术界讨论的重点而言，多是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所在。

俞祖华：激进主义也好，保守主义也好，我们首先对其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要把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定位在现代性思潮上，激进与保守两种态度均是赞成、推动现代化的思想倾向。在西方“保守主义在本质上是要‘保守’自由主义的成果，而激进主义则企图以激进的方式实现极端化了的自由主义原则”。^①余英时提出：最简单地说，保守就是要维持现状，不要变；激进就是对现状不满意，要打破现状。但在近代中国，保守主义的“维持现状”虽不能说是守护自由主义，但绝不是要退回到“前现代”的社会秩序、生活方式与价值形态上，而是希望在大变局中守护民族文化的根

^① 李强著《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4页。

脉；保守主义的“不要变”不是拒绝变革、不要进步，而是希望把变革的程度、速度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所谓“不要变”的范围仅是指仍被认为优于西方的传统价值的超越层面；它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仍然是赞成现代化转型的，只是其对现代性、现代取向作了过于狭隘的理解与取舍。可以这样来定性保守主义：它是一种从传统的视角反思与批判西方现代化的现代性思潮，其基本取向是承认和认可西方的物质文明成果，崇尚传统文化的道德价值与人文主义内涵，致力于从本土文化中转换出现代性因素。正如保守主义一样，激进主义也是作为西方现代化的批判言说出现的，不过保守主义是从传统的角度批评，而激进主义是从后现代、从社会主义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不和谐所进行的揭露与反思。激进主义在寻求中国现代化时表现出了强烈的紧迫感。无论是在现代化目标的设定，还是在现代化途径的选择上，都不难体会其焦灼的心态。如果从现代性的视野出发，激进主义之“激进”在于追求落后的中国（从现代化、现代性的标准衡量）所急需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同时，还急于寻求批判与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现代性。

何晓明：作为现代化思潮的保守与激进，内涵十分丰富，绝非如字面显现的那么简单。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说：真正的保守，就是切实而落于实践的创新。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家章太炎说：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都是着眼于整个社会变革的方略而论，而非单表明维持现状的温和态度或打倒一切的破坏意绪。因此，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应将其置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世界背景之下的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大格局中来加以讨论。18世纪以后，原生型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全球扩张，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激起了普遍热烈的文化反响。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便是在这一过程中，与自由主义相伴生的文化思潮与派别。自由主义全面肯定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价值与意义，对传统文化的变革持温和态度。激进主义彻底反传统，主张以革命方式重建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保守主义则充分褒扬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质优良，批判地、有限度地接受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成果，同时猛烈抨击其负面影响，主张以“返本开新”的方式，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这三大思潮均为应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时代潮流而生，可以被认为是次生型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关于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式的不同选择的理论思考的结晶。

主持人：中国近代史上的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是何时产生的？

何晓明：学界论及保守主义的学者，多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其发端

期。我以为这种说法忽视了自 19 世纪中叶开始，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碰撞、交融半个世纪之久而在思想领域激起的巨大波澜，抹杀了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和“洋务”实行家在保守主义发生史上的真正先驱地位。作为社会思潮或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发生于 19 世纪 60 年代，冯桂芬是有特殊意义的人物。冯氏在 1861 年撰写的《校邠庐抗议》提出要“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实际上揭示了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全部理论宗旨的核心和要害。其后一个半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种种发展形态，无不继承了它的血脉，打上它的印记。相对于保守主义，激进主义的发生要晚 30~40 年。戊戌时代的谭嗣同，对传统的君主专制政治与文化持猛烈的批评态度。在温和的体制内改革面临绝境的危急关头，他不惜铤而走险，图谋以绝然方式推进改革，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有《仁学》中已经明白表露的激烈主张作为思想基础的。我以为，19 世纪 20 世纪之交从谭嗣同殉难到孙中山革命方略的成熟，是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形成期。更具体地说，1905 年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将近代中国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三大主题昭示于人，是激进主义形成的标志。

俞祖华：在追溯保守主义的源头时，将现代性的保守主义与极端的保守主义、封建的保守主义加以区别是很有必要的。封建顽固派的保守传统、卫护旧秩序，与作为现代性思潮的保守主义根本沾不上边。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理论也还谈不上是现代性的思潮，它只接纳科技的现代性而排斥人文的现代性，拒绝现代性向科技以外的其他领域扩展，包括拒绝儒学的现代性创新，与守护传统但着眼于传统的现代性转换的文化保守主义是不应加以混同的。我认为，无论是政治保守主义还是文化保守主义都可以追溯到戊戌思潮。康有为的新儒学既主张“保教”，又主张对其作出现代性的诠释；既接纳现代化，又展示了比西方现代性更为美好、更为完善的大同前景，体现了文化保守主义对传统既认同又革新、对现代化既有批评又坚持现代化导向的品格，是比较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严复则可视为中国政治保守主义的先驱，这与其作为“中国自由主义之父”的身份并不矛盾，因为正宗的保守主义恰恰是守护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与成果。他激烈抨击专制主义，但又认为取消君主政治“其时未至”，批评康、梁等“鲁莽灭裂”，主张变革过程中权威主义、强人政治，这与现代政治保守主义所强调的渐进主义与秩序原则是契合的。至于激进主义，我认为也可以追溯到戊戌思潮。被归为激进主义一脉的各种思潮中社会主义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支，而社会主义作为西方现

代性的批判言说被中国思想家关注是从戊戌思潮开始的；戊戌思潮还是力主大刀阔斧式的现代化变革乃至革命的政治激进主义的起点。因此，作为现代性思潮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是从戊戌时期开始相伴而生的。

郑大华：我不同意以 19 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为中国保守主义的起源。因为 19 世纪中叶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文化主张，虽然是后来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对中国近代社会影响至远至深的思维模式的最初表述，但在当时它不仅不具有保守的性质，相反还是一种相对激进的思想，在 19 世纪中叶还有什么样的文化主张比“中体西用”更激进呢？没有。因为在当时整个社会对西学缺乏正确的认识，以为学习西学就是“以夷变夏”的情况下，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论，一方面强调中学之“体”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肯定西学之“用”的辅助作用，主张破除成规习见，引进西学以弥补中学不足，从而实现以中学为本位、为主体的中西文化之间的调和或互补。这无疑是对传统的“中体中用”文化观的否定和突破，从而为学习西学扫清了道路。“中体西用”成为保守主义的文化理论，那是后来的事，是后来社会发展了，人们对中学和西学的各自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进步了，但在当时它并不具有保守的色彩。我也反对将中国最早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头衔戴在戊戌时期的康有为以及他所代表的维新派的头上，因为康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是为“托古改制”亦即维新变法服务的，不具有保守的性质，也不是文化理论而是政治性的论述。在我看来，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都发端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而正式形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戊戌时期的张之洞因在《劝学篇》中对“中体西用”论的系统阐发而成了中国最早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文化保守主义团体是辛亥时期以章太炎为精神领袖的国粹派。国粹派基于对中西文化“双重危机”的反省和认识，既对那种脱离中国文化生命机制的“欧化”主张表示出了深切的不安，也不赞成一味守旧，拒斥西方文化的一切因素，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出路就在于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实现中西文化的折中调和，具体来说就是中国的精神加西方的物质。而这正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特征。有学者反对把国粹派说成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们主张反清革命，是革命派。这种说法混淆了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与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这样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文化激进主义最早也是在戊戌时期出现的，谭嗣同在《仁学》中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激烈批判，樊锥和易鼎在《湘报》上提出的中国“大政鸿法，

普宪均律，四民学校，风情土俗，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一切制度，悉从泰西”的主张，可以说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激进主义之先河。到了20世纪初，所谓“欧化”、“欧化主义”这一类体现“文化激进主义”价值取向的词汇在报刊上已屡见不鲜。1907年6月由吴稚晖、李石曾创办的《新世纪》周刊，既是革命派内部一个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也大力宣传过所谓“欧化主义”。当然，无论是文化保守主义，还是文化激进主义，真正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则是在五四时期。其时以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以吴宓、梅光迪为代表的学衡派，以章士钊为代表的后期甲寅派，都属于文化保守主义派别，而陈独秀、胡适、吴稚晖等人则是这一时期著名的文化激进主义者。

主持人：中国近代史上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相互关系？

郑大华：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激进与保守之间不是简单的两极对立、非此即彼，而是既互为矛盾、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关系。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各有着相对独立、各有特色的价值系统、政治立场与文化观念，并在推进中国文化的前进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起到了不同的作用。激进主义在社会转型、文化转型时期的一定阶段往往起着打破旧的政治秩序与已僵化的旧传统，实现深刻社会与文化变革，开创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的新局面的作用，而保守主义则可以起到对过度的激进进行制衡、对现代性的弊端进行修正，使传统在现代化变革中不至于断绝、使民族文化有得以继往开来的作用。但激进和保守都存在于同一历史时代中，面临着相同的“前现代”传统的内容和具体的历史处境，因此也就自然有交叉交集、相近相似、相辅相成的一面。以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文化激进主义者而论，在文化问题上，他们思考和企图解决的都是如何对待传统，如何引介西学，如何建设新文化的问题，换言之，也就是如何处理“西学”与“中学”、“传统”与“现代性”和“西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他们也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实际上，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文化激进主义者，在本质上都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提出保守或激进的文化主张的目的，都是出于振兴民族，救亡图存，为中华民族选择一条强国富民的文化出路的考虑。当然，其主张在客观上的正确与否另当别论。他们也都反对中国实现现代化，只是各自选择的方向和道路有所不同而已。文化激进主义者主张照抄照搬西方的经验，走西方工业文明即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老路；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应是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加西方近代的“物质文明”。正因为

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文化激进主义者之间有着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再加上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化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在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文化激进主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转化的关系，或者是前一时期的激进者到了后一时期成了保守者，或者是前一时期的保守者到了后一时期成了激进者，或者是保守与激进同时交战于胸中，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这种转化关系有时还表现为前一时期的激进思想或观念到了后一时期则变成了保守思想或观念。

何晓明：余英时认为，保守就是维持现状，而近代中国没有一个值得维持的现状，保守主义很难有什么立足点，所以中国思想史上的保守跟激进，实在不成比例。姜义华则认为，保守主义显然并非不要变，或是要求变革较少，而只是要求使变革范围于特定的价值取向之内，如尊重传统、尊重权威、维护民族主义等等。因此，保守主义者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恐怕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保守主义势力不是太弱，而是太强。但我以为，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不是谁强谁弱的关系。从理论上讲，双方都有存在的历史依据和逻辑依据；从社会实践的基础看，双方都有可以依凭的利益集团作为社会基础。实际上，近代中国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并非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水火不容。就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大目标而论，双方绝无分歧。在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方面，保守主义的理性思考更为辩证；而在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构建方面，激进主义的创造精神、牺牲精神更有利于难局的突破和道路的拓展。如果说在国难当头、时局危急的当年，人们无暇坐而论道，那么在政治安定、思想解放的今天，我们理应以平和的心态和科学的精神来辨析两者的关系，以期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俞祖华：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激进与保守之间对立很明显，有过激烈的交锋，但互动也很多且很密切，所共同具有的“共同观念”体现在各个方面：都有着强烈而深沉的民族主义关怀，只是以不同的形式表达着这种诉求并选择了激进与渐进的不同手段；都是现代性思潮并都对西方现代性有所反省与批评，只是批评的角度与修正的思路有所不同；在人类社会的远景规划上都认同社会主义的目标，激进主义思潮自不必言，属于保守主义阵营的康有为、梁漱溟、张君勱等人也提出了大同思想或表达了空想、改良性质的社会主义思想；都有浓郁、炽热的传统情怀，一些激烈批判传统的思想家，在其激进反叛、弃之如敝屣的姿态与话语背后，那种对某些传统价值的理性认同、那种对故土文化的归依怀恋、那种对传统话语的信手拈来、那种对传统思维方式的延续沿袭、那种沟通调和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不懈努力，仍有

线索可循。历史上激进与保守有过激烈的对峙，但当我们去反思历史时应当有更高、更大的格局，两者应当互相制衡，互为灵感的源泉，共同收获思想激荡的成果。反激进话语批评激进主义给中国旧有的基础带来极大的破坏，反保守话语批评保守主义使中国变革不断受阻，但真正引发严重社会政治后果的可能是激进与保守之间只有对峙而没有对话、只有交锋而没有交集。

主持人：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

何晓明：保守主义所要表达的是一套完整的价值系统。作为价值系统，它既可以是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又可以是一般的社会心理。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看，在西方，保守主义直到 19 世纪才正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在此前，“保守”作为以谨慎态度对待任何变革的心理倾向、气质、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在民间已经有长久的存在。正如塞西尔所说：“天然的守旧思想是人们心灵的一种倾向。”尤其是在历史悠久、文明遗产丰厚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心理，拥有异常广阔深厚的民众基础，拥有鲜明的“公众性”；另一方面，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保守主义，因为其承载的社会集团（或共同体）利益要求、政治统治合法性证明和社会导向功能，又具有更鲜明的“非公众性”。就近代中国而言，作为社会心理的保守主义的意义、作用和影响，远远大于作为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在近代中国，作为社会心理的保守主义，拥有十分宽厚的民众基础和顽强的传统力量。我们应当承认保守主义对民众思想实际影响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同时又要引导人们避免为其后顾性的文化取向、泛道德主义的价值取向所束缚，真正以健康、科学、乐观的心态，尊重历史，善待当下，创造未来。同样，激进主义所要表达的也是一套完整的价值系统。作为价值系统，它既可以是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又可以是一般的社会心理。从一般社会心理的角度，激进主义特别符合近代中国挣扎于贫困死亡线上的下层民众的激奋情绪。既然旧世界使我们一无所有，那就干脆打它个落花流水。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相反，冲决一切“网罗”，颠覆传统，蔑视权威，主张以暴力打碎现存的社会秩序和国家机器。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异常激烈，传统包袱沉重且内忧外患交相逼迫的近代中国，激进主义更符合心绪焦灼、情感激越、救亡图强愿望急切的精英集团的思想倾向与策略选择。无论人们的感受如何，赞同与否，激进主义无疑引领了近代中国历史演进的方向和速率，推动了现代化进程在古老中国大地上的凯歌行进。对这一既存的历史事实，我们理当怀抱理解和尊重。至于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曲折、反复，理应从中国社会及中国文化的内在特征、近代中国与近代世界相互关系的特点

等方面去寻找更深刻的原因，而不应该简单地将其一板子打在激进主义的屁股上。当然，检讨激进主义引领近代中国历史演进的方向和速率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也是学术理论界责无旁贷的研究任务，但是，这种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之路更加宽阔平坦，而不是简单地宣布从此“告别革命”。

郑大华：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我国学界的文化研究与文化反思出现了明显的转向，这就是从1980年代“文化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否定，到1990年代出现“国学热”，某些学人“放弃激进的社会/政治批判话语，转而采取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话语”^①。批判激进主义似乎成了时尚。海外学者早在1980年代就已经展开了对激进主义的批判。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认为五四时期反传统主义的深度和广度在现代世界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称以后数十年中文化反传统主义的各种表现都是以五四激进反传统主义为出发点的，批评这种彻底的全盘反传统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带来了中国意识的危机，并将五四反传统与“文革”并提。1988年9月，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的演说，认为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一个思想不断激进化的过程，保守力量几乎没有起到制衡作用，中国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文革”就是这种思想不断激进化的结果。海外学者对激进主义的批判，很快得到了中国学者的响应。在他们的反激进主义话语中，“五四”因其激烈的反传统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造成了现代中国人不识古字、不通古文、道德传统沦丧、人文精神失落，“五四”对于20世纪中国文化激进主义乃至政治激进主义的泛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五四”反传统的评价可以说是我们反思与检讨近代思想史上的文化激进主义的焦点与关键所在。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站在新世纪的高度对发生在20世纪初的这场影响深远的文化运动进行全面审视，是十分必要的。但反思与检讨“五四”，应该实事求是，反思与检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我们不能认同上述反激进主义话语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传统的断裂、“五四”所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引发了现代史上种种灾难性后果等说法。反激进主义话语在激烈批评近代思想史上的文化激进主义的同时，也对政治激进主义进行了发难。这股批判政治激进主义的学术思潮怀疑、否定近代以来的历次革命，还有人进一步认为变法、改革也过于激进了。他们把戊戌变法的

^① 李泽厚、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东方》1994年第5、6期。

失败主要归因于改革派的激进，将辛亥革命的发生说成是激进主义思潮的产物，而将中国现代化的延误归咎于辛亥革命以来的历次革命。相反，对维新派的激进改革与革命派的流血革命打断了以慈禧太后为首之清政府的渐进改革表示遗憾和惋惜。这种对近代政治激进主义的批判，一是尊重史实不够，有主观臆造之嫌，如有人在批判辛亥革命的所谓激进主义时，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而是从假设的前提出发，得出了辛亥革命搞糟了，打断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否则，中国就有可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结论；二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夸大主观观念、某一思潮的作用，须知历史本身是复杂的，历史的发展不是某一个人某一派别的思想或某种思想观念甚至某种思潮主观愿望的结果，是历史发展为包括激进主义在内的近代各种社会思潮提供了思想史的舞台而不是激进主义在规定着历史的发展方向。决定历史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不是观念，任何思潮的作用都不可能大到“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地步。

俞祖华：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进的，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历过沉沦、磨难，甚至在重新恢复国家独立之后也发生过像“文革”这样的灾难性事件，但其总趋势是从饱经屈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转变为一个正在实现伟大复兴、正在崛起中的东方大国，是从“前现代”的、落后的古国成长为现代化的新兴国家。“激进与保守”与中华民族命运发生巨大变化的整个过程相始终，我们不能要求某一思潮仅对这一过程中的曲折与灾难负责，不能把“搞糟了”都算成是激进主义的事。作为近代以来长时期处在主流地位的激进主义是与包括“文革”这样的灾难在内的整个历史运动过程息息相关的，而不是仅与其中的灾难与恶果有关，同为现代性思潮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对曲折迈向现代化的历程不必“争功”也无须“诿过”。既然历史是在曲折中前进的，这就提醒我们不能以历史运动的成败论是非，一场运动、一场改革、一场革命的失败，既不表明某一失败了的运动、改革与革命不具有历史合理性，也不应据此得出以相对保守或更加激进的事件取而代之历史就能平稳发展的假设性结论。历史研究既不能从假设出发，也不能搞想当然的推理，正像我们不能从“文革”后迈向了改革开放推定出“文革”搞对了一样，我们也不能从辛亥革命后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推理出辛亥革命“搞糟了”的结论来。从1840年到20世纪初，历史已经给予了清王朝足够长的时间，在这一时段里中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中华民族再也经不起让清王朝“慢慢来”的折腾了。那时以后，经过近一个世纪以来先后发生的三次伟大革命，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

附背景链接：1988年9月，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演讲，指出：基本上中国近百年来是以变革、变动、革命作为基本价值的，“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最后一定要激化到最高峰，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1992年4月，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在香港《二十一世纪》上发表争鸣文章《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余英时也在《二十一世纪》同期发表申辩文章《再论中国现代思想中的激进与保守》。《二十一世纪》从此成为“保守与激进”大规模、长时段论战的主要阵地。1993年，北京大学陈来教授在《东方》杂志创刊号上发表《20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一文，全面反思“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此后，激进与保守之争成为热点。《开放时代》1997年第2期有陈炎对姜义华教授的访谈《激进与保守：一段尚未完结的对话》。2003年11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思想史研究室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北京联合召开一个小型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研讨会。已经出版的有关激进与保守的著作有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郑大华的《胡适与梁漱溟：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的比较》、李世涛主编的《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喻大华的《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研究》、何晓明的《返本与开新——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新论》等。

CONTENTS

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对话	郑大华等 / 1
“常”、“变”之争和“主义”之辨下的保守与激进	
——“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分法商榷	何卓恩 / 1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强力政府论”：激进乎？保守乎？	
——基于梁启超、孙中山相关思想的考察	闫润鱼 / 15
保守与激进之间的选择	
——论战后有关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几种学说	卫春回 / 27
“拉斯基”还是“哈耶克”？	
——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中的激进与保守	张世保 / 41
儒学与民主：文化保守主义民主观念的近百年变化	李维武 / 66
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主义崇拜	
——严复与胡适对自然公理论的批判及其启示	萧功秦 / 96
中国化激进主义谱系生成探寻	张宝明 / 111
革命进化论与陈独秀的启蒙激进主义	高力克 / 131
梁启超的政治学	
——以明治日本的国家学和伯伦知理的受容为中心	川尻文彦 / 146
清季部分官员反立宪思想探略	
——1906~1911年	迟云飞 / 164

批评、改造与超越

-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改造代议制思潮 邹小站 / 178

伦理与政治的互摄

- 论王闿运以礼自治的致用之道 刘 平 / 215

儒家经济思想研究的开拓之作

- 陈焕章与他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 欧阳哲生 / 228

- 钱玄同与刘师培 刘贵福 / 247

- 再论顾颉刚“疑古”思想的核心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吴根友 / 265

- 贺麟对“五伦”观念的新阐释与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左玉河 / 284

从“华夷”到“中西”话语的演变

- 《瀛寰志略》与近代民族观念的孕育 王先明 / 295

佛门的保守与激进：民国初期“佛化新青年”思想的

- 两重解析 李少兵 / 310

在激进与保守之间：中华教育改进社与 1920 年代的

- 三次学潮 何树远 / 321

- 历史语境下的大江会国家主义 禹 江 / 348

30 年代《独立评论》与《再生》杂志文化观

- 之激进与保守 王 毅 / 368

- 再评 1930 年代的新启蒙运动 房德邻 / 380

“康学”与湖南的维新运动

- 兼论湖南维新变法的不同路径 贾小叶 / 396

反思、宽容、超越

- “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 刘颖涟 / 427

“常”、“变”之争和“主义” 之辨下的保守与激进*

——“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分法商榷

何卓恩

内容提要 学界常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分法来描述近代中国主要思潮，实际上这种来自西方的描述方式并不适合于中国近代。中国近代思潮经历了以“常”、“变”之争为主轴到以“主义”之辨为主轴的演变，在前一时期表现为文明变迁上“保守主义、调适主义、激进主义”的历时态推进，后一时期主要表现为建国目标上“民族主义（保守的理想）、自由主义（温和的理想）、共产主义（激进的理想）”的共时态竞合，而在行为手段方面，“保守方式、渐进方式、激进方式”的分歧则贯穿前后。这三种情况下所显示的保守与激进，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

关键词 “常”、“变”之争 “主义”之辨 保守 激进 思潮

激进与保守是一对后设概念，系站在今人立场观察和反省历史的一种范式。在此一范式下，学界对近代中国各种思潮已有不少考察，既有明察秋毫的微观个案研究，也有高瞻远瞩的宏观总体探索，^① 这些探究在激进与保守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关系研究”（07JJD770100）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① 微观研究如马洪林《略谈戊戌变法的“保守”与“激进”》，《文史哲》1998年第5期；蔡明伦：《康有为：激进与保守的悖论》，《学习月刊》2003年第12期；俞祖华：《论严复的激进与保守》，《中州学刊》1992年第5期；李永东：《激进与保守之争：重评“五四”》，《山西师大学报》2007年第6期；柴文华：《激进中的保守与保守中的激进：以胡适、梁漱溟为例》，《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2期；李茂民：《在激进与保守之间——梁启超五四时期的新文化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张宝明：《“调和”与“独行”》；（转下页注）